

通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

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

精华

后汉书（一）

主编 廖盖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毛泽东读《后汉书》

《后汉书》是毛泽东生前非常喜爱并反复阅读过多遍的一部史书，他不仅自己读，还将该书推荐给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阅读。由此可见他对《后汉书》的喜爱及重视程度。

《后汉书》是继《汉书》之后，我国古代第二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书，共一百二十卷，包括本纪十卷，列传八十卷，志三十卷，主要记述东汉建武元年(25)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(220)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，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《后汉书》的作者为范曄。范曄，字蔚宗，小字砖，顺阳郡顺阳县(今河南内乡县人)。东晋安帝隆安二年(598)他出生在累代官宦的书香之家，其先世屡仕晋朝。纵观范曄一生行事，受其父范泰影响较大。范泰博览群书，善于文章，为人嗜



酒而不拘礼仪小节，撰有《古今善言》二十四篇及文集流传于世，一生数因公事及失礼而遭黜罢。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和有家学渊源，范曄在少年时期，就显露了才华。《宋书·范曄传》称他是：“少好学，博涉经史，善为文章，能隶书，晓音律。”可见，他是一个具有广博学识，且有多方面才能的人，不但通经史，而且精于书法和音律。

范氏《后汉书》的特点之一是在每篇纪或传之后著以评论，有的传前撰有小序，各篇之后均缀之以赞。这些论、序、赞，我们合称之为范氏的史论。

《后汉书》的确是毛泽东非常喜欢并经常阅读的一部古书。他在阅读《后汉书》卷一《汉光武帝纪》时，曾在第17—18页上批注：李贤好。刘放好。李贤贤于颜师古甚，确然无疑。裴松之注三国，有极大的好处，有些近于李贤，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，使读者感到爱看。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，其此之谓欤？譬如积薪，后来居上。章太炎说，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，英豪巨眼，不甚然乎？毛泽东称赞李贤注《后汉书》贤于颜师古《后汉书》远甚，表明了他的史学倾向。即后者对原著充实了大量史料。颜师古是训诂学家，他注《汉书》偏于考订文字，多所证明。对这两种不同的治史方法，毛泽东更喜欢前者。

毛泽东的这一段批注写在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中，显然，



毛泽东对于《后汉书》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事迹是非常熟悉的。1948年11月4日,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河南南阳,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《中原我军占领南阳》的消息,其中写道:“后汉光武帝刘秀,曾于此地起兵,发动反对王莽的战争,创立了后汉王朝。民间所传二十八宿,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,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。”在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历史关头,对刘秀曾“受尚书,略通大义”的文化素养及其“主要干部”“大半多习儒术”的历史事实颇为熟悉的毛泽东在战事报道中写了这番话,不能不使人推想,其笔下当时很可能自然流露出了在历史转变时期,对于改进自己队伍的文化成分的热切期望。据《后汉书》卷一《汉光武帝纪》载:刘秀(前6—57),字文叔,南阳蔡阳(今湖北枣阳西南)人。西汉皇族。东汉王朝的开创者。谥号光武,庙号世祖。王莽末年,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,刘秀加入了绿林军。在昆阳战役中,绿林军以少胜多,打败王莽的军队,刘秀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后来,刘秀脱离更始帝刘玄自立,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军,平定了许多割据政权,统一了全国。

刘秀在位期间,效法西汉前期的治国政策,释放奴婢,减免租赋,精简军政,裁并郡县,兴修水利。发展生产。同时又任用文官,削弱三公权力,限制外戚参政,加强中央集权,出现了“光武中兴”的局面。刘秀是靠豪强地主的支持取得政权



的，所以，豪强地主在东汉有特殊的地位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央集权。

毛泽东对汉光武帝刘秀的一生是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的，并曾多次把《汉光武帝纪》推荐给身边的工作人员阅读。1959年5月，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学历史，便把《后汉书》推荐给他读，还说：西汉高、文、景、武、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，东汉两头均无意思，只有光武可以读。东汉光武刘秀，乃为“中兴之帝”，经历一番征杀，遂承续汉家基业。

毛泽东对《后汉书》的史学地位和文学成就都曾给予过高度的评价，他曾在卷九十一至卷九十四第二十一册的封面上批语：《后汉书》写得不坏，许多篇章，胜于《前汉书》。

毛泽东读《后汉书》卷七十五《袁安传》时，曾在第2页上批注“可以争论”；在读卷九十二《陈寔传》时，在第13—14页上批注：章炳麟学陈仲弓一事。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；《后汉书》卷一〇一《皇甫嵩传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：“（皇甫）嵩、（朱）俊各统一军，共讨颍川黄巾。俊前与贼波才战，战败。嵩因进保长社。波才引大众围城。嵩兵少，军中皆恐。乃召军吏谓曰：‘兵有奇变，不在众寡。《孙子兵法》曰：“凡战者以正合，以奇胜者也。古善出奇，无穷如天地，无竭如江海。战势不过奇正，奇正之变，不可胜也。”今贼依草结营，易为风火。若因夜纵火，必大惊乱。吾出兵击之，四面俱合，田单之



功可成也’。”毛泽东读到此，即批注：正，原则性。奇，灵活性。由此，毛泽东在读书时的认真程度及其深刻见解可见一斑。

据《后汉书》卷九三载，李固（94—147年），东汉汉中郡南郑县（今属陕西）人。精通古代典籍，在学术界享有很高成望。顺帝时指出当世主要弊端是皇帝亲小人而远贤人。他的用贤才而疏远外戚的建议被顺帝采纳，他被任命为议郎，并一度出任荆州刺史、太山太守。以用和平办法平息两地农民起义而闻名天下。冲帝时与梁冀同为宰相，最终因与梁冀发生冲突而被杀。

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写到：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，他从洛阳走到成皋，叹道：世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。……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。我少年时曾经说过：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击水三千里。可见神气十足了。便又不很自信，总觉得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，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。……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：峣峣者易折，皎皎者易污。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。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这后两句，正是指我。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。人贵有自知之明。……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，吹得越高，跌得越重，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。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天骄、一代伟人，就在于他能以古鉴今，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。



黄琼、李固都是东汉人，以耿直方正、敢以国事为重，忠言谏君著称。黄琼建议顺帝“改敝从善，择用嘉谋”，以避旱灾；批评他即位后，“不行籍田之礼”。批评恒帝褒崇大将军梁冀太过份，应“使天下知赏必当功，爵不越德”。直到临终之前，还上疏直谏，指出：“…即位以来，未有胜政。诸梁秉权，竖宦充朝”，“忠臣惧死而杜口，万夫恐祸而木舌”等弊端，表示自己“…身轻位重，勤不补过，然惧于永殁，负衅益深。敢以垂绝之日，陈不讳之言，庶有万分，无恨之泉”。李固向顺帝直言“当世之敝”，招致宦官等的陷害，被贬官。复职后，仍多次上书对“奸秽重罪，收付诏狱”，在职期间，秉公执法，“奏免百余人”。冲帝死后，梁冀专权，李固坚持立“年长有德”的清河王蒜为帝，又遭梁冀陷害，被杀。1965年，毛泽东读到《后汉书·黄琼传》、《后汉书·李固传》时，认为值得一读，亲手批了：送刘、周、邓、彭一阅，送陈毅同志一阅。这几位同志都在百忙中及时阅读了。毛泽东对历史上这些敢于坚持正确意见，勇于斗争的事例是十分重视，十分赞赏的。

毛泽东喜欢读《后汉书》里的《黄琼传》、《李固传》，首先因为这两个主人公正直敢言的致仕之道，所以推荐给许多高级干部读，其用意即是为了在干部队伍中更好地树立正气。

毛泽东最为欣赏的，当然是李固写给黄琼的信，特别是其中“峣峣者易缺，皎皎者易污”。《阳春》之曲，和者盖寡；盛名



之下,其实难副”几句话。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读了这几句话,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,又写了这几句话来作自我剖析。信中反复说到自己的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,说到山中无老虎,猴子称大王等等,都使人从一个侧面体会到毛泽东在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后的内在心态。这里面有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结局的思虑,也有谦虚,有对自己的清醒认识,总之,“人贵有自知之明”。这大概是他读李固给黄琼的信体会最深的一点。

1974年,毛泽东再次说到《黄琼传》里的李固给黄琼的信。这年11月12日,江青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由自己组阁的人选名单,毛泽东当天就在信上批示:“不要多露面,不要批文件;不要由你组阁(当后台老板),你积怨甚多,要团结多数‘至嘱’人贵有自知之明”。11月19日,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,说“自九大以后,我基本上是闲人,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,目前更甚。”显然是伸手要官。

11月20日,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封短信:

江青:

可读李固给黄琼书。就思想文章而论,都是一篇好文章。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,这已经是大任务了。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,不要说没有工作。此嘱。

毛泽东

七四,十一月二十日

这封信对“李固给黄琼书”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他劝江青阅读,即是劝她应该“有自知之明”。

毛泽东对这篇好“文章的”的词句记得非常熟。他读《新五代史》时,看到卷六《唐明宗本纪》里有一句话:“呜呼!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!”随即批注:“后汉李固之言。”李固给黄琼信中的原文是:“自生民以来,善政少而乱俗多”。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对这篇“好文章”的喜爱与烂熟于心。





《后汉书》概论

《后汉书》是继《汉书》之后,我国古代第二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书,共一百二十卷,包括本纪十卷,列传八十卷,志三十卷,主要记述东汉建武元(25)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(220)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,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—

《后汉书》作者为范曄。范曄,字蔚宗,小字砖,出身仕宦之家,多才多艺。范曄的仕途是随着父亲范泰投效刘裕开始的。晋义熙十四年(418),刘裕还彭城,受命相国宋公,范曄任



为相国掾，不久，又投刘裕第四子义康幕府。刘裕代晋后，封义康为彭城王，进号右将军。范晔先在义康部下任冠军参军，又随转任右军参军，历时四年左右，入朝补尚书外兵郎。宋文帝即位，父亲范泰解国子祭酒职，致仕，乘轻舟游东阳，不问朝事。两年后，文帝杀徐羨之等，朝政稳定，范泰再度入朝做官，因他是刘裕的旧臣，文帝备加优待礼遇。考虑范晔有脚疾，文帝特地准许他乘舆宴见。此时，刘义康改任荆州刺史。范晔再度投为义康部下，任荆州别驾从事史，受到刘义康的厚遇。不久，范晔被朝廷召为秘书丞。范晔三十一岁时，父亲去世，范晔以丁忧去职。两年后，复官，到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手下任司马，领新蔡（治今河南新蔡）太守。檀道济是战功卓著的北府名将。元嘉七年（430），北魏军逼近滑台（今河南滑县），文帝加道济为都督征讨诸军事，率众北伐。范晔刚刚过了两年居忧的闲散生活，很难立即适应征战之苦，听到北伐之令下，声称患有脚疾不便行军，文帝不许，但照顾他乘船负责由水路运送队伍和军械。北伐军回师后，范晔调任彭城王义康手下为司徒从事中郎。这时的义康已入朝为司徒，录尚书事，又领平北将军，南徐州刺史，与王弘共辅朝政。义康是皇族，所以王弘凡事推辞，形成义康一人专揽朝政之势。范晔这次回义康手下任职已是第三次，相互间的关系自然又增进了一层。不久，范晔升任尚书吏部郎。元嘉九年（432），受其父范泰“好



酒，不拘小节”的影响，而又远不如范泰练达的范晔，闯下一场大祸：这年冬天夜晚酣饮，醉后开北窗听义康之母下葬之前的挽歌为乐，事情被义康知道，大怒，贬范晔为宣城太守（今安徽宣城）。这件意外的灾祸，便成为范晔一生事业的转折。在宣城太守任上，他郁郁寡欢，乃转而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历史研究。

范晔纵观历代诸家所写的东汉史书，总觉得不够满意，或剪裁不当，或疏误甚众，或干涩乏味，或体例不周，因而他决心发愤撰写，著述一部具有独特风格、超过前人的东汉史。时年三十五岁的他，开始了《后汉书》的撰写。

约在元嘉十七年（439）时，范晔调任始兴王刘浚（宋文帝第二子）部下为后军长史，领下邳（今江苏睢宁西北）太守。范晔由后军长史升任左卫将军，与右卫将军沈演之同掌禁军，参预机要。元嘉二十一年（444）范晔任太子詹事。次年，他被人告发说参加了孔熙先等人谋立刘义康为帝事，以谋反罪被处死，时年四十八岁。他死后，《后汉书》“志”尚未完成。今本《后汉书》的十志，是南朝梁刘昭在为范书作注时，因范晔生前曾赞扬过晋人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，遂将其中的八志，分为三十卷，加以注释增补，附入范书之中。起初两书各自单行，至北宋真宗乾兴元年（1022），判国子监孙奭奏请把两书校勘合刻，至此两书始合为一书。



范曄所生活的时代，距后汉的灭亡已有二百余年，他编写《后汉书》的主要史料来源为前人的著述。关于东汉一代的历史，在《后汉书》之前，已经不少人撰写，范曄以《东观汉记》为基础，博采众书，斟酌去取，自订体例，写成《后汉书》。《后汉书》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一家之作，立意超过以往记后汉历史的诸家之作。

在体例方面，范曄比较了纪传体和编年体——即他所称《春秋》的长短，指出了《春秋》的短处，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。比较的结果，他拟以班固《汉书》为范本。范曄对全书事前有周密的安排，原计划是十纪、十志、八十列传，合为一百篇以与班固的《汉书》相应。但范曄只完成了十纪，八十列传，十志则托付给谢俨撰作，将要完成时，遇范曄被杀，文稿皆散佚。范书的本纪、列传虽承袭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体例，但是也有他的创新。范曄这一改变是有他的根据和用意的。因为，东汉自和帝以后，当皇帝的都是十岁左右的小孩，雉子无知，政权往往掌握在太后和外戚手中，太后临朝听政习以为常，所以将皇后列入本纪，是反映了东汉时期这一历史特点的。刘知几对



此颇不以为然，认为皇后只应称传而不能称纪。其实《皇后纪》始自华峤《后汉书》，范曄只是根据史实要求，采用华峤的体例而已，这正符合史家变通之旨，是无可厚非的。

在本纪中，范曄继承和发挥了司马迁的附记方式。范曄也将在位短暂，史事不多，独为一卷内容太少的皇帝，与前任皇帝合为一卷。例如殇帝刘隆，即位时还在襁褓之中，在位仅八个月，无事迹可记，遂附于《和帝纪》卷中。另将年幼、在位时间不长的冲帝、质帝与顺帝合为一卷。

《列传》是《后汉书》主要组成部分。《后汉书》列传目录有名有姓的达五百余人，超过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数目。这样，对如何剪裁安排这些史料，使其简明而又周密，脉络清晰而又不遗漏重要史实，范曄也有创新。从全书来看，对一些无关大局的人物，即便是身居高位的王侯卿相，也不单独立传，只散见各纪、传。相反，对地位虽不高，但于社会历史有一定影响的人物，则单独立传。由此，可见对各个传记人物，范曄是经过刻意斟酌、悉心核订的。

人物传记大多以类相从，即将人物才学、品德、事迹相同或类似者，共列为一卷。如邓禹、寇恂都不仕王莽、更始，而投奔刘秀，共为一卷；将割据称帝王的王郎、刘永等八人合为一卷；郭泰、符融、许昭以清高有人伦之鉴、知名当世而合为一传等。范书列传中也多用附记方法记载同类人物，有的人虽记



载不多,但多叙其姓氏籍贯,如《来歙传》记述了共同谏废太子的郑安世等十七人履历。范曄除继承原有的儒林、酷吏、循吏等类传外,还新创了《党锢》、《宦者》、《文苑》、《独行》、《方术》、《逸民》、《列女》七个类传,充分反映了东汉历史的变化和特点。而《列女传》,是纪传体史书中的创举。它把社会上有才学和品德修养好的妇女,列入史册,用专传记载下来,这的确很有意义。范曄为妇女立专传,在很大程度上是突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的,弃富安贫的鲍宣妻、事婆母至孝的姜诗妻,女史家班昭、孝女曹娥、女文学家蔡文姬等的事迹,就是因为《列女传》而保存下来。范曄将蔡文姬收入《列女传》,多为后来的封建文人所讥诮,认为蔡文姬几次改嫁,是不应当列入的。蔡文姬先嫁卫仲道,后没于匈奴而归左贤王,为曹操赎回以后,再嫁给董祀为妻。殊不知范曄设立这个类传,不是专为表彰节烈,而提出要“搜次才行尤高秀者,不必为专一操而已”。

《后汉书》还为少数民族立了六个列传,即东夷、南蛮西南夷、西羌、西域、南匈奴、乌桓鲜卑,不仅包括了当时的各个主要民族,还记载了四周与东汉王朝关系密切的国家,保存了少数民族和中外关系的大量史料。

范氏《后汉书》的特点之一是在每篇纪或传之后著以评论,有的传前撰有小序,各篇之后均缀之以赞。“序”为立传的宗旨和类传之纲。《后汉书》的《皇后纪》和孝子、处士、党锢、



循吏、酷吏、宦者、儒林、独行、方术、逸民、列女、东夷、西羌、西域诸传均作序，共十五篇。序作为一种史书体例，是由司马迁首先采用的。范曄沿袭这一体例，有其独到之处。大体说来，《后汉书》序的用意有三：一是概述事物的渊源流变。二是指出了立类的标准。三是说明序论的依据。范曄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儒家经典，尤其是孔子语录。

“论”大多是借古喻今，评论时政和人物的得失，为正史纪传所必备的体例。《后汉书》有论一百二十一篇，凡一万五千八百余言。这是范曄史论的主要部分。范曄自认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列传的序论。如《党锢》、《宦者》的论都是著名的史论文章，不仅内容上有其独到的见解，而且文笔豪放畅达，气势磅礴。在运用儒家道德，评论历史人物的是非时，范曄是鼓吹仁义、崇尚忠信、表彰气节的。范曄作论，是有论则发，无论则缺，不求勉强发论，像孝子、循吏、文苑、独行、列女五传没有论。而每卷论作几篇，则视具体情况而定。如《皇后纪》和邓寇、桓丁两传各有三篇论，《隗嚣公孙述传》以下二十卷各有论两篇，其余六十二卷各有论一篇，这就使论在运用上较为灵活。

“赞”是对该人物的评价。魏晋以前修史，本不作“赞”。“赞”作为纪传体史书的一种体例，是由范曄首创的。《后汉书》赞九十篇，三千二百六十四字。范曄修赞，沿用《春秋》笔



法，一字一句皆作褒贬，或直言，或隐喻，字里行间反映出范曄对历史人物、事件的一些具体看法。在“赞”中，范曄都很注意揭示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。如赞梁商父子，则说：“商恨善柔，冀遂贪乱。”像这样的赞语，在《后汉书》中所占比重很大。《后汉书》的“赞”这种体例一经创立，便得到一些史家的推崇和采用。萧子显、李百药撰南、北齐书，唐修《晋书》，都采用了这一体例。

范曄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，就是通过上述三种史论形式反映出来的。总而言之，在历史观方面，他既认为“天”、“命”对社会的变革起决定作用，也承认英雄人物对历史的进程有重大影响，不过所谓“天”、“命”指的是历史所趋、民心所向的社会政治形势。在政治方面，他向往“仁政”，反对暴政，在道德观方面，他作为封建传统道德的拥护者，尽管有个别超脱之处，但终究还在宣扬“仁”、“德”、“孝悌”、“忠贞”、“信义”那套儒家行为规范，并把它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理论根据。在人物评价方面，他能够遵循历史事实，对每一类或每一个传记人物，进行具体的分析，指出其社会地位和作用，这同其他封建史家相比较，可以称得上“立论持平，褒贬允当”。

范曄在《后汉书》中，还将东汉时代有较高价值的文学、政治、经济方面的文章整篇的或摘要载于有关人的传中。如崔攄的《政论》、桓谭的《陈时政疏》、王符的《潜夫论》中的五篇、